

# 当代中国文化治理的生成逻辑与 维度建构

复旦大学 唐亚林

**[内容提要]** 文化治理作为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始全面嵌入并引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由“发展才是硬道理”所建构的当代中国国家现代化发展模式,塑造了文化发展服务于经济发展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尴尬角色与夹缝命运。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发展战略的确立,推动了文化发展从“失位”向“复位”的回归,并推动了文化治理从“搭台逻辑”向“阵地逻辑”的转型。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的文化治理的主体性建构,一方面立足于几千年以来中华民族的基本需求与精神信仰,另一方面是一个包括主体建构、内容建构、体制建构、机制建构在内的复合内容体系。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而综合奠定的文化自信,将为当代中国的文化治理与文化强国建设拓展全新的发展空间。

**[关键词]** 文化治理;现代化发展模式;生成逻辑;维度建构;文化自信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进行定位,这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由此,当代中国开启了将国家治理全面引入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并将国家治理所作用的领域全面拓展至政府治理领域、市场治理领域、社会治理领域、文化治理领域、生态治理领域、司法治理领域、国家安全治理领域、军队治理领域、共产党党内治理领域等范畴。<sup>①</sup>这其中,有效的政府治理、

<sup>①</sup> 唐亚林:《国家治理在中国的登场及其方法论价值》,《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有为的市场治理、有德的文化治理、有序的社会治理是引领国家治理诸多作用领域的关键性要素，而有德的文化治理则起着把这些关键性要素有机地整合在一起的独特作用，并形成了推动当代中国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独特动力机制。

正因为文化治理起到了打通并引领国家治理诸多领域的独特作用，十八大报告特别强调“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sup>①</sup>文化治理除了对一国国民价值观的形成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而且还对同一发展模式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应用，产生深刻的影响，进而产生决然不同的后果：“为什么理想社会发展模式与现实之间出现了如此大的反差，并且这种反差在不断扩大呢？答案要从文化中去寻找。所有民族的所有文化都由为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而设置的控制机制构成。构成各种社会文化的社会标准被认为增强了社会的结合和生存。因此，通常体现在诸文化中的社会标准有利于最大限度地繁衍以保证种族的永存，最大限度地生产以保证经济的维持，最大限度地加强军事力量以保证实际的生存。”<sup>②</sup>

因此，文化治理作为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可以为以国家为代表的各类共同体提供基本的价值规范和行为模式，另一方面可以为共同体成员构建“安身立命”的价值基础，以及“心有所寄、心有所安”的心灵秩序，从而为整个社会的和谐有序运行奠定根本的秩序基础。

## 一、“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发展的尴尬角色与夹缝命运

### 1. 文化发展的尴尬角色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尽快改变贫穷落后的发展面貌，当代中国走上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全面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为导向的现代化发展之路。改革开放以后，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的转型与确立，直接推动了当代中国国家现代化发展模式呈现出鲜明的经济业绩优位的发展

<sup>①</sup> 十八大报告文件起草组：《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1页。

<sup>②</sup>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吴象婴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90页。

特征,即以国内生产总值(GDP)高速增长为导向的发展型政府成为推动现代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其直接后果就是造成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在现代化进程中呈现出独特的阶段性“跛脚效应”。

一般来说,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包括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社会领域的城市化以及价值观念领域的理性化等多面向发展维度的互动过程。<sup>①</sup>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头10年将近三十年的发展时间段里,当代中国现代化发展首先让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多面向发展维度呈现不平衡的特点,即经济领域的工业化长期占据主导位置,呈现“一边倒”的发展态势;其次,由于思想认识的时代限制,现代化进程的多面向发展维度被压缩为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两大发展维度的话语表达;第三,在推进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不平衡状况,或者说“一手硬、一手软”的发展格局;最后,在精神文明建设领域,其基本内涵更多地被压缩为思想意识形态教育,忽视了对广大民众日益增长的公共文化服务与产品需求的有效提供与满足。

1989年政治风波发生后,邓小平在检讨过往精神文明建设的经验与教训时,特别强调“十年来我们的最大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教育发展不够”<sup>②</sup>,就从一个侧面验证了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狭窄内涵式角色定位之写照。而在许多地方官员的眼里,“文化发展”难以用量化指标来衡量的“软性”特征,以及难以通过“看得见摸得着”的绩效方式直观表达的“隐性”特点,让文化发展“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由此,也把文化发展的尴尬角色暴露无遗,即文化发展相对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政绩塑造等硬性指标来说,始终处于“可有可无”的工具化角色之境地。

## 2. 文化发展的夹缝命运

虽然文化发展在现实生活中往往被以经济工作为主导的其他工作所取代,但在各地推进以招商引资为核心的经济工作的过程中,基于各地风景名胜、历史人物、自然矿产资源、风土人情、神话传说等而开掘的各类文化资源“大戏”,却成为各地争相打造的一张张屡试不爽的“名片”,而且还美其名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于是,文化发展的独特经济性功能在各地争相上演的“文化搭台、经济唱

① [美]西里尔·E.布莱克:《比较现代化》,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7页。

戏”的大戏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开发。每到春暖花开时节,各类桃花节、梨花节、樱花节等纷纷上演;一到夏秋之交,各种收获果实的特色品牌节庆活动纷纷出笼,乃至高价邀请明星歌星助阵演出,成为家常便饭。为了争夺老子故里、西施出生地、诸葛亮出生地、梁祝故事发生地等“名人故里”,各地奇招频出,乃至伪造信史,目的都是为了扩大当地影响,“筑(文化)巢引(经济)凤”。至于如炎黄帝祭祀大典、孔子祭祀大典则是高官云集、宾客盈门。

这种借助各地特色文化品牌而打造的各种招商引资活动,其基本结局就是文化作为“一次性消费品”,“用过即扔”,大多是“轰轰烈烈地开场,悄没声息地收场”,甚至建筑了大量的“三国城”“水浒城”“鬼城”等,既劳命又伤财。恰恰基于各地地方特色文化的戏剧、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不到有效保护和继承,不断衰亡和消失,更谈不上对民俗民风、民情民意的教育、塑造与回应。

## 二、阵地逻辑:当代中国文化治理的生成逻辑

### 1. 文化发展从“失位”向“复位”的回归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当代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虽然助推了当代中国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时间里很快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也导致文化发展的“失位”现象日益加剧。文化发展服务于经济发展的尴尬角色与夹缝命运,导致文化发展本应具有载体性功能、工具性功能、价值性功能的“三位一体”整体功能格局出现失衡状况,尤其是文化发展所独具的核心价值引领功能与心灵秩序塑造功能,日益受到物质消费与金钱崇拜的侵扰,造成整个社会出现“核心价值观迷失”的现象。

“文化失位”现象在具体文化发展领域,主要呈现三大特征:一是以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文化站、电影院等核心的各类文化基础设施建设长期得不到有效的经费保障,年久失修,功能荒废;二是以各类文化事业单位为主体的文化发展主体力量,不仅人浮于事,而且有一技之长的专业人员大量流失;三是以文化政策、文化体制为核心的文化管理体制,长期处于封闭保守的境地,官本位意识浓厚,失去了对社会民众文化需求的敏感识别与有效回应的功能。

面对文化发展长期“失位”状况,2011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高度,不仅强调了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明晰了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从指导思想、奋斗目标、重要方针、思想道德基础、基本文化权益、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体制机制创新、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责任等方面进行全面而深入的部署。与此同时,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相继出台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战略规划与建设举措,掀起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高潮。自此,当代中国文化发展掀起了回归其战略地位的新篇章。

## 2. 文化治理从“搭台逻辑”向“阵地逻辑”的转型

在改革开放以后三十多年的时间里,由于人们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当代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的认识出现了偏差,导致文化发展出现服务于经济发展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之“搭台逻辑”,忽视了文化发展的社会效益问题,更背离了文化治理的意识形态属性,以致出现了“五重五轻”现象:一是重视文化发展的经济效益问题,轻视文化发展的社会效益问题;二是重视文化活动的强身健体功能,轻视文化活动的国民价值塑造功能;三是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轻视文化服务的提供;四是重视文化的基础设施建设,轻视文化的核心价值引领;五是重视文化的管理手段的强化,轻视文化治理的体制机制再造。

由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战略规划而推动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有力地扭转了文化发展的“跛脚效应”局面,推动了文化治理从“搭台逻辑”向“阵地逻辑”的转型,并且从多方面建构文化治理“阵地逻辑”的十大内容体系:第一,基本指导思想,即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全面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第二,发展规划体系,即在《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指导下,相继实施《国家“十二五”、“十三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并制定由文化部门具体推进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实施纲要》。第三,公益性平台体系,即推进以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文化馆(站)“三馆一站”为主体的公共文化公益性平台建设。截至2014年底,全国共有文化馆3313个,其中省级馆31个、地市级馆354个、县市级文化馆2928个,乡镇(街道)文化站41110个,全国共有县以上独立建制的公共图书馆3117个。<sup>①</sup>第四,建设主体力量,即由各级公务员队伍、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社区工作者、各类文化活动爱好者为核心的主体建设力量的正式形成。第五,实施工程体系,即以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农家书屋建设工程为核心的

<sup>①</sup> 屈蓠:《公共文化建设迈入新阶段》,《中国文化报》,2015年11月6日。

公共文化惠民工程体系。第六,运作机制,即以政府购买服务为核心的“菜单”式公共文化服务配送机制。第七,财政保障资金,即成立保障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文化发展基金。第八,法律规范,即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2016年12月25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自2017年3月1日起施行。第九,协同发展模式,即形成文化资源、文化资本、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四位一体”协同发展模式。第十,发展格局,即建构党建引领下的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一体化新格局。

### 三、文化主体性:文化治理的维度建构

#### 1. 文化治理的主体性实质来源

人类文明的演进,是由社会职能分工的细化而推动的社会控制机制、自我控制机制与国家控制机制三者日益交织与复合,并逐渐形成的特殊秩序的结果。这种相互交织的秩序决定了历史变迁的行程,也是文明进程的基础。<sup>①</sup>毫无疑问,文明的进程是一个“能去旧创新、有选择、新陈代谢的过程”。<sup>②</sup>而文明体现在不同的地域,并与不同的族群的结合,产生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形态,经过以国家为核心的共同体的有机整合,便形成具有高度稳定性和自主性的价值秩序。因此,费孝通把文化的内涵界定为:“就是共同生活的人群在长期的历史当中逐渐形成并高度认同的民族经验,包括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伦理准则、社会理想、生活习惯、各种制度等。这是在千百年的历史中形成的民族经验,具有相当的稳定性。”<sup>③</sup>

当代中国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毫无疑问立基于几千年以来中华民族的基本需求与精神信仰。这种基本需求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追求“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个体生存需求,二是追求“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社会交往需求,三是追求“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的国家发展需求<sup>④</sup>;这种精神信仰鲜明地集中于一点,即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sup>⑤</sup>的高度认同。这种基于中华民族的基本需求与精神信仰的传统文化基因,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

① [德]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发生和心理发生的研究》,王佩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443—458页。

② 费孝通:《中国文化的重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9页。

③ 费孝通:《中国文化的重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8页。

④ 唐亚林:《中国式民主的内涵重构、话语叙事与发展方略》,《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6期。

⑤ 费孝通:《中国文化的重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6页。

国家的一体化整合与创造性转化,形成了今天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即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国家层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之价值,社会层面“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之价值,个体层面“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之价值。<sup>①</sup>

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的文化治理,体现了鲜明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两大基本特征,进而型构了文化的主体性实质。文化的主体性实质指的是认识主体的“自我认识、自我理解、自我确信、自我塑造、自我实现、自我超越的生命运动,及其表现出来的种种特性,如自主性、选择性和创造性等;它是认识主体通过实践和反思而达到的存在状态和生命境界,展现了生命活动的深度和广度,是生命自觉的一种哲学表达”。<sup>②</sup>

## 2. 文化治理的主体性多维度建构

当代中国文化治理的主体性多维度建构,是一个包括主体建构、内容建构、体制建构、机制建构等在内的复合内容体系。

### (1) 文化治理的主体建构

对于治理的维度分析,通常是采用三分框架,一是治理的主体从传统的国家或政府为中心,走向了包括国家(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公民等多元主体在内的多中心治理主体体系;二是治理的体制从传统的等级森严的科层制走向了扁平化的网络体系;三是治理的机制从传统的政府独家垄断走向了以参与为核心的竞争机制。

文化治理的主体性实质决定了不能简单地套用治理的三分维度框架,而应该坚持认识主体所坚守与倡导的核心价值观地位,进而形成国家(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共治主体格局。具体到当代中国文化治理的主体建构,这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主导的,包括各类企业、各类社会组织、所有公民有序参与的“一体多元”主体格局,这也是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本属性决定的。也就是说,任何偏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属性的文化治理主体建构,必将导致文化治理的主体性实质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 (2) 文化治理的内容建构

传统上,人们通常把文化治理的内容建构局限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集中于传统的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而忽

① 十八大报告文件起草组:《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2页。

② 郭湛:《主体性哲学:人的存在及其意义》(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9页。

视了文化治理是一个既包括有形的硬件建设又包括无形的软件建设的综合内容体系。

作为文化治理的有形的硬件建设,主要内容包括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体系,通常以项目建设的载体形态而呈现,如包括图书馆、博物馆、文化站等在内的公益性文化平台体系,以及包括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等在内的工程类文化项目体系;作为文化治理的无形的软件建设,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意识形态体系建设,二是以文化传承与创新为核心的文化知识生产与再生产体系建设,三是以文化发展权利为核心的公民文化权利体系建设。

从当代中国文化治理的内容建构的发展实际来看,最为重要的工作,是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以享受平等的公民文化权利为保障,打通城乡公共文化体系建设的鸿沟,全力推进具有高度自主性的文化知识生产与再生产体系建设,从而为中国人的生存与发展建构“心有所安、心有所寄”的心灵秩序。

### (3) 文化治理的体制建构

当代中国文化治理的特殊性,除了上文提到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意识形态体系建设属性外,还体现在由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治理工作。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治理工作这一质的规定性,首先决定了必须保证马克思主义在文化治理工作中的指导地位,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导权,掌握文化改革发展领导权,确保党对文化治理工作的政治责任,形成党对社会主义国家文化治理的领导体制。其次,要将文化治理的党性与人民性有机统一起来,形成党的宣传思想部门与政府的文化工作部门有机配合的党政二元治理体制。最后,根据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特征,探索开创基于党建引领的公共文化建设新体制,尤其是开创基于城乡一体化的公共文化服务新格局。

### (4) 文化治理的机制建构

一般而言,文化治理的机制建构,包括责任机制、指导机制、财政机制、平台机制、整合机制、购买机制、竞争机制、评估机制、价值创造机制等内容。责任机制,是指文化治理由谁主管、由谁主办,就由谁承担领导责任和主办责任;指导机制,是指上级党委、政府和部门肩负着对下级党委、政府和部门在文化治理方面的日常指导之责,以确保文化治理的正确发展方向;财政机制,是指通过设立专项预算和各类发展基金,对各级党委、政府和部门开展的文化治理

工作提供资金支持和经费保障;平台机制,是指文化治理工作离不开各类文化工程和文化项目建设,需要搭建包括各类公益性文化平台,开展各种公益性文化活动,以丰富人民群众的日常文化生活;整合机制,是指各级党委、政府要不断推进文化服务部门、文化服务产品、文化服务技术、文化服务网络四者的有机对接,促进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的融合,发展新型文化业态;购买机制,主要是指党委和政府通过灵活多样的“菜单式公共服务购买活动”,积极回应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竞争机制,是指在公共文化服务的生产过程中,积极引入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推动公共服务生产与提供的分离,并且实现公共服务生产的高效化;评估机制,是指通过引入第三方评估等方式,从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等多维角度,对基于公共财政的文化治理绩效,进行有效评估,不断提升公共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价值创造机制,是指充分发挥文化资本的撬动与增值作用,推动文化资源、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一体化进程,不断为社会公众、企业、政府和执政党创造实现文化传承和发展的价值基础。

## 结语:以文化自信全面拓展当代中国文化治理的新空间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是当代中国文化治理的根本发展目标。文化与生活密不可分,文化首先体现为全体国民的生活质量与道德素质的提升。文化治理要取得实效,并获得高度的认同,必须落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并通过切实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这种持续发展的动力,一方面来源于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与制度综合奠定的文化自信的力量,另一方面来源于文化治理所建构的“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文化强国的力量。

因此,全面拓展当代中国文化治理的新空间,首先需要我们不断挖掘基于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基本需求与精神信仰的传统文化基因,并根据当今时代人们集生产、生活、生存、生态和生命“五生”需求于一体的共同体需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一体化整合与创造性转化,成为引领当代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文化自信的价值内核,建构当代中国文化治理的价值基础。其次,需要我们在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用丰富的物质文明成果和精神文明成果,切实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与精神文化需求,用不断增长的获得感和满意度来增强对文化自信的认同度,建构当代中国文化治理

的物质基础。最后,需要我们对当代中国文化治理所涉及的与贯通的各治理领域的体制机制进行全方位再造,推动文化治理的多元治理与共享格局的尽快形成,通过文化治理的主体建构、内容建构、体制建构与机制建构,释放文化治理的活力,创设文化强国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动力,建构当代中国文化治理的制度基础。

## The Developmental Logic and Dimensional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al Governance

Tang Yalin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modern national governance, cultural governance begins to be fully embedded in and guide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During more than 30 years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mod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national modernization by “the absolute principle of development”, has shaped the embarrassed role and the creviced fate of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form of the economy’s effects with the help of the culture’s performa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strategy of great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great prosperity, has directly promoted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from the status of being lost to the status of being returned, and has promo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al governance from the scenic logic to positional logic. The subjectivity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governance with the guidance of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comes from the basic needs and the spiritual belief of Chinese ethnic peoples for thousands of years on the one hand, and consists of subject construction, content construc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mechanism construc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based on the mixture of the road, theory, system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ill expand a new developmental space for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governa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powerful nation.

**Key words:** cultural governance; mode of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al logic; dimensional construction; cultural self-confidence